

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

访问录选编

(周保中同志专辑)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 编 辑 说 明

为了研究中共东北地方党史和东北抗日联军史的需要，我们编印了《访问录选编》。

本辑选编了九篇访问周保中同志记录，二篇周保中同志回忆性文章。这些资料有的是我所访问的，有的是从有关部门收集和交换来的。本辑是按访问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的，除对标点、个别字、句和结构作了一些修改之外，其它方面均无改动。为了查阅方便，在编纂过程中，拟上了付标题。

本辑访问录未经全部核实，仅供内部研究之用，不宜外传、翻印和公开引用。由于我们编辑的水平不高，肯定会有一些错误和缺点，希望批评指正。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地方党史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十月

目 录

- 问周保中同志记录（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
- 关于满洲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和路线问题…………… 1 - 85
- 问周保中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日）
- 关于东北党组织的路线问题，民生团问题和赵尚志问题… 36 - 90
- 问周保中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
- 关于民生团问题和中朝关系问题…………… 91 - 93
- 问周保中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五日）
- 关于东北地区的特点和东北党史的分期问题
- （对东北地方党史大纲意见之一）…………… 94 - 100
- 问周保中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六日）
- 关于祖国光复会问题和东北党组织的路线问题
- （对东北地方党史大纲意见之二）…………… 101 - 108
- 问周保中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七日）
- 有关土龙山事件、联军总司令、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 以及抗联后期的斗争情况
- （对东北地方党史大纲意见之三）…………… 109 - 114
- 问周保中同志记录（一九六〇年九月）
- 谈东北十四年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作用、评价和教训

## 访问周保中同志记录

### ——关于满洲党组织的发展

#### 情况和路线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

#### 一、东北党组织活动概况

满洲党组织从一九二五年就有了活动。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六年时间，是一个阶段；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九三”，十四年时间，是一个阶段；从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年时间，是一个阶段。总共二十四年的历史。在东北光复以前这段历史时期中，重要的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这十四年是比较突出的阶段。

满洲党组织的活动发展与全国党是一样的，它是全国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满洲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是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夜。从全国来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是处于第一次大革命阶段，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是处于土地革命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到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是从南往北，从西往东进攻的，这时人民群众到处都自发的起来抗日了，就是旧军队也消极的起来反日，如马占山、丁超、李杜、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

唐聚五、耿继周、邓铁梅、王凤阁等等。在这种形势下，满洲省委从南满迁到北满，并组织由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的广大的人民反日武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党直接领导的以工农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发展了，游击队改编成为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党的组织，游击区也扩大了，以抗日救国会为中心的群众团体组织起来了。工人运动也有发展，但不突出。游击战争实质就是农民战争。

一九三七年以后，斗争更尖锐了。敌人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统治，采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手段来消灭反日武装和镇压人民抗日活动。另外采取“归屯并户”深沟高垒等方法制造“无人区”，企图断绝党和人民的联系。没有人民就谈不到人民武装了。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游击战争转入了不利的形势，党转入了困难的时期，党内问题也多发生在这个时期，这时的问题是在三六年末就开始了。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三年中满洲党统一了组织，统一了军队，实行保存实力，保存干部，争取和联系群众，创造条件，展开新的斗争。八一五前夜，苏联出兵东北，全部击溃和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东北抗联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这一伟大战争，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由此进入新的时期。

在这二十四年的过程中，满洲党的组织，武装斗争和群众组织，都经过了迂回曲折的道路，从挫折失败，再挫折再失败的革命斗争中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从满洲党的组织发展变化情况来看，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大连、沈阳就有党的活动。开始是特委（在沈阳建立奉天特委），组织发展的情况是从南到北的，当时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与大革命的任务是一致的。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城市、工矿。大连船厂、奉天附近兵工厂、企业、抚顺、本溪等地的矿山和北宁铁路、南满铁路、中东铁路都有我们党的工作。工人、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是党工作的基本对象。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东北也有国民党，和我们一样，也处于地下，奉系军阀反对我们也反对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末到一九二八年初，在沈阳建立了临时满洲省委（包括辽、吉、黑和热河东部），省委所在地开始在南满的奉天。当日本侵略东北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和军阀的统治更加厉害，满洲省委几次遭受了破坏。我们要挑选其统治薄弱的地区来开展工作，同时又考虑到我们将来的斗争（从田中奏摺看出，日本的野心不仅侵占满洲而要吞并中国和进犯苏联），因此，省委迁移到北满的哈尔滨。

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一九三〇年这时工作重心在城市，主要在工人、青年学生、自由职业者中间工作

作。迁到北满之后，到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党的组织发展扩大了，工作也深入到农村（以前农村也有党的工作），领导各地党组织，加强扩大各地的抗日救国运动，创造各地区的人民武装抗日游击队（赤色游击队）。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省委变动了组织。这时由中共中央代表团直接指示东北游击运动，省委的组织不存在了。从一九三五年末到一九三七年初，在这两年的时间中，由驻满洲代表吴平同志领导（在延安正风时，看来吴平同志是个好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

一九三六年开始变四个省委。按当时斗争形势，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全中国，引起民族矛盾的加深，国内阶级斗争有和缓下来的趋势，国共合作出现了可能。国际的形势也很紧张。中共中央估计到了这个形势，看到了日寇的野心，想把满洲作为侵略整个中国的根据地和反苏的前哨。东北人民和日寇的斗争，越来越残酷了。一个省委指导游击战争是不方便的，同时认为今后掌握武装，坚持游击战争更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是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来的，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作了决定，确定满洲省委为四个省委，由中央代表团（当时在苏联远东海参崴建立了机关）进行领导。当时指定由魏拯民同志传达所带回来的文件和精神，并指定：南满省委书记杨靖宇；东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吉东由我考虑决定，如果工作太忙，可叫宋一夫担任；松江省委书记李成林（那时是勃利县委书记），是个经过革命斗争考验和有理论修养的好同志。后被土

匪打死。

地区的划分：南满——旧奉天东边道为中心（通化）、三角地带、辽东半岛与沈阳至热河一带。东满——延吉、和龙、晖春、汪清、安图、敦化等地（现在的延边自治区），以及桦甸和长春东南地区。吉东——宁安、苇河、绥阳、东宁等地（东八县）和松花江右岸到乌苏里江左岸。松江——松花江北岸、巴、木、通和黑龙江南岸齐齐哈尔等地。除上述四个省委外，还有两个特委：奉天特委（实际上包括在南满省委以内）和哈尔滨特委。

关于组织变动情况是一九三五年秋决定的，到一九三六年初组织变动了。

东南满省委：由杨靖宇、魏拯民同志负责。

吉东：由宋一夫负责，我主要负责军队工作，下属道南道北两个特委。宋叛变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在吉东省委和路军党委扩大会上决定，省委书记由周保中担任。

松江省委问题很多，赵尚志是个人野心家，这时最坏的倾向表现出来了，他借成立四个省委之机，自作主张，乱搞一通，不听区域划分，一九三六年夏召集了珠河汤源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把冯仲云从珠河县委找回来当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曾被赵尚志排挤到珠河当书记，后赵为实现其野心，认为冯好摆弄，又找回冯当省委书记。冯仲云同志当时有弱点，迁就了他这不正确的决定。东南满



和吉东的关系很正常，有些问题经过商量就解决了，不象和北满的关系那样，北满是另外一套。

一九四二年八月四个省委合并成立了东北党委员会，委员有周保中、崔石泉、张寿箴、金策、冯仲云、季青、王效明、柴世荣、姜信泰、金日成、安吉、鲁东生（宋明）王一知（妇委）、沈泰山（青委）等人。委员会书记由崔石泉同志担任。一九四五年七月崔回国后东北党委员会改组，成员是：周保中、冯仲云、张寿箴、鲁东生、姜信泰、金光侠、王效明、彭施鲁、王明贵、王一知、刘雁来等（记着还有王钧）。周保中担任书记。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与东北局接上了关系，东北党委员会才取消了。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这时期抗联将近两千多人（其中远东中国工人和苏联的纳那伊人占半数多），全都合在一起，成立了教导旅，我任旅长，在东北党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当时与苏联红军也有联系。那个时候的东北游击活动，是由七、八人至十六、七人为单位编成小队，十五个小部队，分散在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一直坚持斗争到“八一五”东北解放。

“八一五”光复后，当时党的组织分三级：

①东北党委员会（设在长春）领导全东北各地党组织，委员会书记周保中；

②地区委员会：松江李兆麟（张寿箴）负责；黑龙江王明贵、王钧；牡丹江金光侠；佳木斯彭施鲁；吉林王效明；延边姜信泰；派冯仲云同志负

责沈阳地区委员会，并负责找中央恢复联系。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谈话记录)

## 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特点和与朝鲜民族的关系

满洲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从中国的情况出发，中国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就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满洲也不例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个时候祖国的南方是英法势力范围，美国是后来硬挤进来的。十九世纪末期，东北开始是帝俄的势力范围，后来经过中日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日本插进来了，十月革命后，东北情况转变了。十月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旧俄罗斯中所取得的胜利，苏联宣布废除帝俄时期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对中国革命进行支持和援助。这时东北就变成日本帝国主义垄断的势力范围，不许别人插手，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特点，田中奏摺就明显的表露了他想以东北为基点来吞并全中国，然后称霸于全世界的阴谋和野心。

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又是代表东北地主买办阶级的上层统治。我们研究党史实际就是研究人民革命斗争史，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是十月革命后的两个特点。它反映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两次直奉战争上，到大革命时期张作霖的势力直伸入关内到达上海，表现了国际帝国主义支持各系军阀争夺殖民地的斗争。

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主义的压榨下，是要起来革命的。但从东北在中国的地位上讲，他又是与关内许多事情隔绝的，同中国大革命的南方也有隔绝，中国革命是由南方到北方的，因此，东北闭锁状态比较严重，这是东北政治上的特点。在经济上东北也有特点：农民与地主（包括军阀）的阶级分化比较迟缓，因为东北自然资源很丰富，有很多的闲散土地，可供农民耕种，在关内找不到，在云南也没有；东北原土著人数很少，这块土地上大多数（约占70——80%）是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流离失所的失业人，奔走关外，他们携家带小，一个连一个找亲戚托朋友来到东北，他们投靠谁呢？主要是投靠地主来维持生活。地主有两种：一种是与土地直接有关系的地主；再有一种是军阀官僚地主。张作霖、吴俊升、张景惠等都是大地主，他们都有甩手无边的几万亩土地。如：奉天的镇守使韩边外占桦甸县绝大部分土地。这么多的土地谁来耕种呢？只有来东北的关里人耕种。关里来的这些人好容易看到了这么多的土地，由于土地多，土地好，广种薄收，农民对土地的依靠性很大，加之地主开始的剥削手段比较隐蔽，不象关里地租大到倒三七，裸粒必争的程度，但比较起来，还是容易生活（比关里容易）。另外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因为粮食的商品性很大，粮价低，农民有剩余粮食到城镇卖时，还不够拉脚钱和人吃马喂的，到年成不好，粮贵时，农民粮食没有剩余，在这种情况下，关

里来的农民有田种，有饭吃就不想闹什么事了。这主要说明东北农民与地主分化比较迟缓的一个原因，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说明东北经济情况与关里不同的地方，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的，和关里是一样的。

另一个特点是民族关系问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军阀的挑拨，制造的中朝民族关系的矛盾，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里谈谈朝鲜人怎样到东北的情况。

朝鲜人来满洲的有两种人：①自然移动来的，这部分人中又分为两种，一种经济原因占主要，在过去的许多年代里，不断的从朝鲜移往满洲，另一种是一九一九年“三、一”运动之后，移来东北的，他们对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这些人是朝鲜“三、一”运动中的干部和革命群众 ②部分是日本强迫他们来的，并且其中有一部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组织、有计划驱迫着他们有政治阴谋而来的。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有计划的利用被驱迫的那一部分朝鲜人做侵略中国的先锋，进行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活动（万宝山事件就是通过他们掀起来的）。我们应该区分这两部分人，后部分人是使民族关系紧张的原因，这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后部分人所要实现的阴谋。

在经济上的冲突主要是表现在水旱田上的冲突。中国农民习惯于种旱田，朝鲜农民种水田，因此，中国农民对朝鲜农民挖沟引水不满。日本帝国主义，经常使用“土地商租权”来为朝鲜人夺取中国农民土地，

常引起中朝冲突，其实这正是日本进行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活动。这种冲突，由经济的冲突变为政治的冲突。

在政治上的冲突，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来的和朝鲜“三、一”运动后来的朝鲜人，不仅仅是在中国东北地区解决吃饭问题，同时他们还不忘记祖国，还要搞革命活动。这时中国地主军阀和日本走狗借此对中国农民挑拨说“你们好好的过日子，他们来了就搞独立闹共产，闹穷党的勾当”，使之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对朝鲜农民在情绪上对立起来，这样引起了中朝民族隔阂。

“九一八”前夜在满洲的朝鲜人有120—150万人，基本群众是前一部分人，一般是革命的，后一部分人数很少，但他们被利用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前一部分人闹革命，闹斗争。根据我所有的材料看来朝鲜在东北一九一九年就有了党，当时叫朝鲜共产党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与朝鲜本土和上海的共产党都有着联系。当一九二一年中国党产生以后，他仍在独立存在着。

朝鲜党是有缺点的，其主要缺点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纪律等都不统一，比较明显的有十来个派别，如火曜派、新同派、M.L派、上海派、京城派等等。当时朝鲜党的派别斗争也很厉害，不择手段，互相攻击，甚至敌人的奸细都钻进来了，破坏自己的组织，加剧各派间的相互斗争。这时的朝鲜党和中国党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他

们在满洲朝鲜人中，有群众，有组织，也有革命斗争。

直到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六大作出了决定，取消朝鲜党的国际支部，但当时还要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没有党的组织，于是把朝鲜内地党的组织划由日本党来领导，而在满洲的一些党员，合乎中国共产党员条件的吸收为中共党员。中共党满洲省委，执行了中央指示和共产国际六大大会上确定的一国一个党，不得跨国际的原则，逐步的按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接收解散后的朝鲜共产党员。那时的党员干部人数在两千人左右，几乎多于中共东北原有的党员好几倍。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在满洲有所反映，主要是反映在朝鲜人的身上。当时满洲省委由于力量分不过来，所以主要的工作是在南满一带的城市中，而朝鲜族的党员主要是农村。这时朝鲜党刚刚解散，他们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少的朝鲜同志在工作中贯彻路线上都是很积极的。据我所认识的同志来说吧！如：金策同志（是从苏联远东回到东北的）许亨植、李福林等等同志都是很好的干部，他们都是生长在农村，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是中共接收朝鲜同志的时候，因此，立三的盲动路线主要是体现在他们的身上。在延边和松花江下游，吉奉路等地区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在山沟里分土地，建立起来了赤色游击队，并进行了武装暴动，到处向地主主要求减租、减息、分粮，甚至要求分配土地，夺取武装等等。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张学良与蒋介石合谋

向苏联进犯，中共有义务武装保卫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祖国，朝鲜同志携家带小一致的进行反抗，斗争的很激烈，闹了一年多。当时的武装主要是朝鲜农民，由于当时立三路线的影响是有盲动性的。

在斗争中接受了大批的朝鲜同志，一九三〇年时县委书记差不多通常是朝鲜同志，区委书记也是如此，那时宁安县委两个书记都是朝鲜同志（一九二九——一九三一、一九三——一九三二年），延边四个县和勃利、汤源、饶河、宝清、虎林、依兰等地的县委书记也都是朝鲜同志，县委委员大部分是朝鲜同志。这部分干部是党的财宝。

朝鲜同志一方面积极，一方面也加小心，怕带上派争分子的帽子。这些同志在中国满洲党领导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朝鲜干部联系朝鲜农民，朝鲜农民联系中国农民，使之中朝农民消除了隔阂，亲如一家。由于中国党和朝鲜同志对群众的教育，使中国农民在“九一八”以后，广泛的起来进行反日的英勇斗争。这就是说由于他们的工作为“九一八”后掀起的反日斗争准备了条件。所以能够迅速的起来广泛的反日斗争，是因为：①政治环境变了；②党掌握了朝鲜同志也发动了中国农民；③赤色游击队英勇地胜利地不断打击日寇军的模范作用，转变了中国农民对朝鲜的看法，由民族偏见走上民族团结，东满、盘石游击队打仗作出了榜样，农民亲眼看到了朝鲜人对日寇生死斗争是真正打日本，因此中国的农民和基本群众很快的就发动起来了。

在抗联初期，编成的第二军，整个军百分之九十是由朝鲜人党员、团员、工人、农民编成的，这个军组织性强，战斗力强，纪律很好；七军差不多也都是朝鲜人，崔石泉、朴元彬、李学福、徐凤山等为重要领导同志。三军的建立也是朝鲜人，起很大的作用，当时建军时只有七个人，主要的负责人是李启东（朝鲜同志），当然也有赵尚志了。第一军的基础是盘石海龙游击队合并整编后，扩大发展起来的，也是朝鲜人占相当数目和居于领导骨干地位，如李红光同志等等。

此外汤源县委也是朝鲜同志在那里起作用。上面所说的朝鲜人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基本情况是如此。但是，这里要明确的问题是，无论如何还是中国党在那里起领导作用，并不是朝鲜同志单独的在那里活动。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有个决定，这就是把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中的朝鲜群众分出来，建立“朝鲜祖国光复会”，把抗日联军中的朝鲜部队单独编为“朝鲜人民军”，这是一个策略上的决定。这样既能符合当时东北政治形势的发展，又能更好、更便利的号召和动员在满洲的朝鲜广大的群众起来斗争，这样做可以增强我们的力量，又能很好的打击敌人。关于朝鲜党的情况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就谈到这里，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朝鲜同志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牺牲的不少。立三路线时，一声令下，群众都动起来了，实际上都是朝鲜人，一片一片的牺牲了。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年间，我党为了巩固革命队伍，在党内、军队内、群众组织内，清洗坏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和日本奸细是对的，因而首先在东满地区进行了“反民生团”的斗争，这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不采取正确的政策，结果把朝鲜同志弄死了两千多人，真正的民生团奸细并没有几个。我在一九四九年秋离开东北时，在吉林省委会议上作了决定，应在吉林和延边地区建立一个纪念碑，着重纪念朝鲜先烈。但到现在没建立，这点朝鲜同志虽不说，但不是没有意见的。

关于朝鲜这个问题，在编写党史时怎样安排？①要正面的直接的叙述；②要照顾现实，那些是党的路线造成的缺点、错误，那些是非党造成的，不合乎党的要求。我们要直接的叙述，就事实说事实，同时也要照顾现实朝鲜劳动党，朝鲜党有的人把在中国斗争的活动说成是单独行动，流亡在外，从国外反对国内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完全脱离中国的东北革命斗争的统一性，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以后，执行共产国际决定，一国一党，东北朝鲜党认为按个人加入中共党，受中国党的统一领导这是不合适的。今天朝鲜劳动党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是原东北党和抗联的，三年前他们提出了主体问题，实际劳动党组织领导核心的主体是在满的那些同志加上从延安回朝鲜的若干同志，不是南朝鲜地下党的朴宪永，也不是华北义勇军中的那些人。参加满洲党组织的朝鲜同志站起来了，原来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此问题也是